

姑妄集

张鸣 著

张鸣

陕西



谨以此书献给我爱的人

姑妄集



张鸣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姑妄集 / 张鸣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224-08706-2

I. 姑… II. 张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85194号

姑 妄 集

作 者 张 鸣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: 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(传真): (010) 88203378

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6开 16.5印张 1插页 192千字
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08706-2

定 价 26.00元



自序

读书做笔记，是老一辈人教的规矩，可惜我能看书的时候，没有人这样教过我。读书动笔，是从抄书开始的。“文革”后期，能读点什么的人，都很寂寞，因为没书可看。很多人抄写手抄本小说，我则抄我喜欢的书。那时的手抄本，有些是有点“颜色”的，写爱情的，写男女之事的，比如《第二次握手》《少女的心》之类；有些是粗劣的破案恐怖故事，比如《梅花党》《恐怖的脚步声》等等。我不抄这些，因为此前看过不少世界名著，什么《红与黑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猎人日记》等一堆。跟这些名著相比，当时流传的手抄本，实在是太“小儿科”了。记得我当时抄的最多的是诗，有整首的，也有片段；中国古代的居多，也有外国的，比如莱蒙托夫，比如马雅可夫斯基。中国现代诗人的诗也抄，那时候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郭小川，没想到，多少年后，我跟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成了朋友。一个人在少年时代，如果恰巧读过点书的话，

多半都会做诗人梦的，我自然不能例外，一有空，就拼命地写诗。

抄书，因为这些书都不属于我，想要让书中的文字跟自己相处久一点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抄。小说流传速度很快，一本几百页的大部头，上家传下来供你看的时间，无非是三四个小时，下家还等着哪，这点时间，翻过一遍都勉强，怎么可能去抄？能抄的，也就是别人不看的一些书，相对借阅时间要长很多。

凡事养成习惯，就容易成毛病。没书看的时候抄书，等到有书看了，手还是停不下来，整本抄的傻事不干了，但看到喜欢的地方，还是忍不住要摘下来；再进一步，有点感想，随手记下来。后来读研究生，老师说读书要动笔，做读书笔记，不动笔不读书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一直做的，居然暗合古来读书的规矩，大喜。

后来，把自己随手记的读书笔记，整理一下，投给报刊杂志，居然能换来稿费的时候，“大喜”变成“大喜过望”。

下面的这些文字，都是去年一年积累起来的读书笔记，都变成过铅字，换过银子了。跟以前一样，每篇文字都很短，不是我喜欢短，而是我这种随感式的读书笔记，基本上长不了，恰好报刊上也喜欢用这种短稿子，两下一凑合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。有人说，我的文字，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，其实不是。倒是在报刊上都能找到，但真要找起来，也有点难度。

我多次说过，读书是我的习惯性的日常行为，就跟吃饭睡觉一样，能用这样的日常行为换来银子，当然是个令人高兴的事。但反过来，如果换不来银子，而且还费银子，像我从前很多年那样，也没什么不高兴的。人在社会上混，总要有所凭借，即便拉车，也得有把子力气。我的凭借，就是读过一些书，而且会读书，这是一种很微不足道但却很基本的本领。我一向认为，一个人只要有了

这么点基本而卑微的本事，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立足，不仅养活自己，而且还可以活得不错。

当初在农场做兽医的时候，我是全场兽医中唯一一个从来没有经过培训的。那点剿猪骗马、喂药打针的知识和手艺，基本上是我从书上看来的，看了就比划，笑话出过不少，但毕竟我把活儿顶下来了，没耽误什么事儿。上大学学的农业机械，虽然我一点一点都不喜欢，但我学的还算不错，四年平均下来，分数在90分上下。我相信，如果非让我干这行，我也能做一个不错的工程师，因为，我会看书。

感谢上苍，没有让我去做某项技术活来养活自己，从而免去了啃那些技术性的报刊书籍，以增益技能。可以随心所欲地看自己喜欢看的书，随看，随写，写出来变成书，还有人喜欢看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。

在学界，我是一个公认的喜欢找历史“边角料”的人，其实也不是我特意去找，因为读书不拘一格，看得很杂，看的多了，别人不注意的边边角角的东西，自动就出来了，躲都躲不开。既然躲不开，就得想想，说上几句话。越是感觉奇怪的事情，就越是要想。每次下笔，想的工夫是最多的，也最苦，想通了，文章也就出来了。有很多看起来很不起眼的“边角料”，其实琢磨起来，里面有东西。比如拉屎撒尿，放在不同的地方，各有名堂。处在转型中的中国城市，这个古老的问题涉及市政建设的现代化，也有关人的习俗现代化；搁在古代科举，会涉及作弊以及考场文化。士兵都会打枪，但晚清到民初，中国士兵的枪法却普遍地不敢令人恭维，一开仗，放枪多半是为了壮胆，这里面既是一个军事现代化过程的习惯问题，也有国人现代化学习过程中的对细节马虎的老毛病。

在历史的“边角料”里，还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货色，本身就令人忍俊不禁。比如晚清时节，很多国人都喜欢传打进中国的洋人，在中国开科取士；八国联军占了北京，文人非要说是一个妓女豁出身子救了全城的百姓，好像她不豁出来，人家就要屠城似的；一个国军师长，部下军官，居然都用的是妓院里的杂役；目不识丁的督军，偏要写诗，而且还印出来出版……这样的事，单单开列出来，叙述清楚，当然也会有人看，但要我写，就必须说出点名堂来——这就是“为什么”。

其实，我写这些杂碎，就是为了“为什么”这三个字。写者姑妄言之，读者姑妄闻之，如何？



从历史到现实

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/ 3

有关五四的一点乱弹 / 9

失败的自治话柄和古老的大一统难题 / 18

给西太后讲立宪 / 26

明君的昏事 / 31

政治里的巫术 / 35

官家大戏场 / 38

金字塔习惯性颠倒 / 41

风月与官场 / 44

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/ 47

马屁也不易 / 50

铁面法官手里的“冤案”及其他 / 53

廉吏酷吏与忠狗 / 56

一根筋的人出故事 / 60

中国式会议的基本法则 / 63

关于选举的乱弹 / 67

民意何如官意 / 71

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/ 74

文人有什么用 / 77
美国人的“中国戏” / 80
关于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 / 84
那座中西合璧的牌坊 / 88
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/ 91
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/ 94
古人的选美比赛 / 98
弄不好,自己被自己忽悠了 / 101
富不出三代的魔咒 / 104

从现实到历史

哭笑不得的姓氏 / 109
荣誉和面子的闲话 / 112
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 / 115
正常社会的不正常话题 / 118
廉租房与黑社会 / 121
“遭人喜欢”的黑社会 / 125
速成病及其经济 / 128
大赌伤身 / 131
“好人好事”是一种大家浪费的稀缺资源 / 134
高处的拥挤 / 137
马屁与露丑 / 140
“派头”迷幻药 / 143
神不迷人官自迷 / 146
非常态的“政治学” / 149
权力的栅栏 / 154
监督与分肥 / 160
胥吏、积极性和高薪养廉 / 163
“摆平”“摆平术”和“摆平文化” / 167

个人记忆

- 那一夜,童年走了/173
读书:从饥渴到惯性的轨迹/176
有这样一位右派/181
决斗——并非人类的故事/188
猪的聪明以及谋略/191
一个厚道的儒者和他的文字/195
走马观花看凤凰(上)/198
走马观花看凤凰(下)/200
冷寂的共乐园和热心的唐绍仪/203
心平气和说历史/207

品评教育

- 梨子和橘子的奇遇/213
“手搏状元”及其他/216
科举不能走/219
武夫军汉办大学/222
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/225
不识字的好处/228
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/232
学界知识官僚的幸福生活/244
学者变脸:官僚与市侩/247
目光如豆的大人们/255

从历史到现实

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，是个缺乏追问的研究。我们长时间满足于现成的答案、浮在面上的答案，满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、定性的结论，不去做起码的追问，不去拷问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细节背后的因果联系。这种现象，在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上，都有反映，五四当然也不例外，甚至在西方学界，对于五四运动的进一步追问，也很欠缺。因此，就整体而言，五四研究虽然看起来很热闹，但却难以深入。



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

在做历史的人看来，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，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，因为记日记的人，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日记，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，在奋笔疾书的当时，就存了心，日后给别人看。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，这种可能性就更大。不过，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，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，作者对经过的事件，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，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，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。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，日记里说还是不说，说多少，怎么说，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。

不用说，五四运动是件大事，尽管运动的后期，商人和工人也

参加进来,但大体上,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认为,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,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,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,很可能更热心,而前者,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他生活留下什么痕迹。但是,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,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,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,读完之后,得出的印象,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。

在中国,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,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,提到王国维、陈寅恪,总能联系到他。五四运动发生时,他在哈佛读书,专业是英美文学。传统上,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,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,日本威逼中国签订“二十一条”的时候,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。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的动静更大,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,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,但是,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,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。显然,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,当时的美国报纸,对五四运动有报道,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,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。此前此后,关于新文化运动,诸如白话文学、写实主义、易卜生主义,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,乃至胡适、陈独秀,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,可是,五四运动的政治抗议运动,如火如荼,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、工人罢工,最后政府妥协,在他的日记里,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。

当然,如果仔细搜的话,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,至少在三个地方,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。一次是在1919年9月7日,在一篇洋洋洒洒五千余字的日记中,借批评男女同校、女子参政,他写道:“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,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,虽以共和为名,亦切宜整饬纪纲,杜绝纷扰。”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,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,发挥说:“今学生风潮盛起,持久不散,逾越范围,上

下撑拒攻击,到处鸡犬不宁,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,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。中国之人,尚不憬悟,清华之失,尚其小者。”同年4月19日,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:“中国经此一番热闹,一线生计已绝。举凡政权之统一,人心之团结,社会之安宁,礼教之纲维,富强制企致,国粹之发扬,愈益无望。”这番热闹指什么,应该就是指五四。不用说,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,很不满意,很有微词,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,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,即便在日记里,也是如此——日记终要给人看的。

吴宓对五四运动不以为然,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。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,但每次说及,没有别的,就是一个骂字,说新文学是“乱国文学”“土匪文学”(1919年12月30日),说白话文学是“倒行逆施,贻毒召乱”(1920年2月12日),说“白话文学”“易卜生”“解放”是“牛鬼蛇神”“粪秽疮痍”。骂得拽文,也很刻毒,上纲上线。当然,我相信,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,在他看来,五四、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,可怕到不仅“国将不国”,而且“家将不家”,具体地说,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,因为这个运动“邪说流传”,“‘解放’‘独立’‘自由恋爱’诸说盛行,必至人伦破灭,礼义廉耻均为湮丧”。想到这里,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——“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、父子之慈孝、伉俪之亲爱,亦不可得。呜呼,前途黑暗如彼,今日劳愁如此,吾生何乐?诚不如自戕其生,则数分钟内,一切苦难,均冥然不知。清静之极,快乐之极!……”(1920年4月19日)而且,据他自己说,他很长一段时间里,总是有这种念头。

从表面上看,吴宓对五四的看法,跟国内一班儿看到女子剪发、男女同校,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们,没有什么区别,其过敏程度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,毕竟,我们还没有听说,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。不过,吴宓的

牢骚，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，其骨子里，大抵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、未婚同居、下课携手钻树丛、赴“桑园之约”的景象，社会上也有。在中国人看来，太多离婚通奸、寻妓作乐之事，但年少力壮的自己，却什么都不敢做，若干年中，“不得与女人相见，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，一聆哢哢之莺声”，“亦势所不能”。因此夜思梦想，未免“气愤愁惨伤怀”（1920年4月19日）。但是聊以欣慰的是，他同时却发现，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，对此现象很是反感，视为病毒，于是，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，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，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，伦理批判、个性解放的结果，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。因此，在他看来，所谓新文化的“新”，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，等于把垃圾引进来。

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，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，跟督军对着干：直皖战后，归属直系，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：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，跟冯玉祥合作倒戈，成立国民军，为第二军军长，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。五四运动当口，他主掌陕西靖国军，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。

按陈志让的说法，北洋时期的军阀，在文化观上，多属于保守阵营。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，跟国民党走得很近，但也是如此。在政治上，他反对皖系，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，但是却攻击说，徐母的死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（1919年4月21日）。他还崇拜关公，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。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，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，看蔡的《石头记索隐》，而且还知道陈独秀，“然对陈独秀辈之说，亦不觉为是，而觉其放诞甚也”（1919年3月26日）。很可能，在胡景翼眼里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、放浪形骸的名士。

然而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，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。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，也由于陕西偏僻，直

到1919年的5月29日，胡才从《益世报》上看到运动的消息，知道了北京的学潮，上海的响应，蔡元培的辞职。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，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“可斩也”，“否则外交亦无进步，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”。此时，他对于五四运动，基本上还是抄报纸，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。

随着运动的发展，6月中旬，政府被迫让步，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輿免职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，他明显感到高兴，说：“此举或顺天意也，书云，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曹等数人，人怨极矣，天岂有不愿者乎？”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，觉得此人还不错，下台是被只知道“依靠日人，借款买枪，招兵发财”的武人派（指段祺瑞和徐树铮）排挤掉的。（1919年6月16日）此时，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，而“天视民视”的说法，跟吴佩孚的“五四通电”，很是相似。自打这时候起，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，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，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，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，但在胡景翼眼中，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。（1920年7月3日）而到了6月28日，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，不仅英、美、法都乐意帮助中国，而且日本“亦欲让步”（其实不确），胡兴奋之极，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，“予（胡的自称，笔者注）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，公理尚在人心，国或不亡，而是非尚在。”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，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，居然在日记中三呼：“中华民国万岁”，“学生万岁”，“予之事业万岁”！

有意思的是，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。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，“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，再撞其柱。政府诸人惧，又感其诚，遂得许多完满结果。”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，觉得陕西有人。（1919年10月15日）关于这次请愿，屈武也有回忆，不过，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，也没有碰柱子，而是以头碰地“血流如注”。